

孫中山文粹
上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孫中山文粹

上卷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孫中山文粹

下卷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责任编辑：曾宪志

封面设计：智 达

孙中山文粹

（上、下卷）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岭南文化发展公司排版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7 印张 10 插页 745000 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218-02284-7/I·285

定价：平装 65.00 元 精装 8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D683/24 11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黄文俞 黄华华
谢 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黄 浩

主 编：于幼军

副 主 编：刘斯奋 岑 桑（执行） 萧如川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卞恩才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李权时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几点说明

(一)《孙中山文粹》(上、下卷)收录了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包括他在《遗嘱》中提到的四种。此外,为了更全面展示他的广泛的活动,还编辑了涉及其他领域的文字,如少量给亲属的信函。

(二)各篇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三)少数篇章略加删节〔标明(上略)、(下略)等〕,是由于内容重复或与主题关联较少。绝大多数著述,保持原貌。

(四)各篇标题,都按作者自定或当时发表所用的为准。个别篇章,略作修订。

(五)为了便利读者,每篇均加简要的题释和注释。同时,收入《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驱者》一文,作为代出版前言。

(六)各篇的校订,尽量选择较早的、最好的版本为据。明显的文字舛误,直接予以改正。对其他错字,以〔 〕号订正;遇有脱字,以〈 〉号增补。衍字删去,在脚注说明。

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驱者

(代出版前言)

他诞生于暴风骤雨席卷九州大地的峥嵘岁月。曲折剧变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把他铸造成为一代巨人。

任何杰出人物作用于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的眼界、观念和理想总为时代所制约，而其活动只能凭藉现实的舞台，是以堪称“时势造英雄”。但是，历史又是人们创造的，出类拔萃者必然倡导着一定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他们的作为产生的重大能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之，“英雄造时势”也反映了这个课题的又一侧面。

正是这种意义上，孙中山——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驱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他以近40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政治生涯延伸过两个世纪和贯串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前后阶

段。他的足迹和活动涵盖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入于近代化。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孙中山无愧为一个巨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诸多方面的、内涵丰富的。他几次环行世界，能操数种语言；他求学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藏以熔铸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他毕生从事革命的“战争事业”，甚至身兼统帅与“排长”^{〔1〕}；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前固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他经历了更多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曾有过“槁木死灰”般的心境，却能“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满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一位“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的重要角色。他必须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而难免以悲剧告终。他积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先行者——制订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政纲，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

〔1〕《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8卷，第190页。

命运动由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始终攀登奋进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或年龄的增长，都未曾导致思想僵化和盲目性。他从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总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展。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为一个再加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救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的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发展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在这种意义上，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

“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

孙中山的故乡在濒临南海的广东香山县。

唐宋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岭南以“富而通”著称。但他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却不富饶：“负山濒海，地多砂磧，土质饶劣，不宜耕作。”〔1〕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农民生计艰难，他出世时的家境也是非常困苦的。父亲曾在澳门充当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更夫。他从6岁起就参加农家的辅助性劳动，年龄稍长便下田操作。番薯成为经常的主食。小孩子很少有鞋穿。困苦的生活无疑在童稚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他后来曾自称“我是苦力，同时也是苦力的儿子”〔2〕。在他看来，“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3〕。幼年和少年的遭际使他“早知稼穡之艰难”，他后

〔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页。

〔2〕L.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 1934.9.4.

〔3〕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北京，1952年出版，第5页。

来倡导民生主义显然与“境遇之刺激”有关〔1〕。

香山，蕴含着可歌可泣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的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更是广泛流传。刚刚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给少年孙中山以深刻的印象，他从返乡的太平军战士的口中了解到天国英烈的壮举，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出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奋斗精神哺育了孙中山，使他深情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2〕。

生活的困苦没有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沉浸于自己的多种意趣：游水、捉鱼、放风筝、踢毽子；到附近武馆看三合会员练武；与小伙伴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直到10岁，方才入塾读书。他为节约灯油而在月光下阅读，但对不求甚解的背诵儒家经籍颇为不满。周围的封建陋习开始引起他的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反对家人给姐姐缠足，并因诘责专横的胥吏险被刺伤。愚昧、苦难和窒闷的社会氛围，使这个喜欢思索的少年常常感到困惑和痛苦。

孙中山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看新世界，甚至甘愿离乡

〔1〕〔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2〕《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8页。

背井——虽然水碧沙明的兰溪和草木苍翠的金槟榔山长系心头，并在长期流亡异域时化为浓郁的乡愁。他虽终未一睹镇上牧师保有的世界地图，但外部的信息不断传到素以侨乡见称的香山。而他的长兄孙眉还在 70 年代之初就远航到夏威夷（檀香山）去作劳工，并逐渐拥有了商店和牧场。他对太平洋中那个“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岛心向往之，终于在 12 岁时跟随母亲踏上泊在澳门码头的英轮，经历了 20 余个昼夜的航程，抵达了万顷碧波环抱的檀岛。澳门是他走向世界的起点，远行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增加了新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而在夏威夷居留的 5 年中，他在美、英教会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开始学习英文。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显然给他以很大的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2〕

他于 1883 年夏辍学回国。开阔的眼界，新的知识和感受，变革的热忱，“神圣的权力不是永恒”的观念，……使青年孙中山对故土感到陌生、忧虑和愤懑。他从香港换乘的沙船初入国门便受到清吏的勒索，令他疾呼“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能坐视不救吗？”遵从亲人们的意愿，他在翠亨参加耕作和继续自修。同村的青年陆皓东、杨鹤龄等同他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抨击官府

〔1〕《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7 页。

〔2〕《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395 页。

的弊端，提出改良乡政的各种措施。然而，乡居生活并未长久。他们反对封建迷信的活动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檀岛时就不以崇奉关帝为然，于今乡民膜拜北帝庙中的木雕泥塑益发使他反感。“劝勿忘信”没有效果，他与陆皓东进入庙中折断北帝直竖的中指，又将金花娘娘的脸蛋用指甲搔成花面，还对北帝大加申斥。笃信神灵的乡民非常惊恐和愤怒，把亵渎神像者视为“疯孩子”。他的父亲只得应允修复神像，而他则被迫前往香港。在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后，他与陆皓东受洗为基督教教徒。教义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留下了痕迹，科学则又使他逐渐摒除宗教观念——“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稣教之不合论理，因不安于心。”结果，“大倾向于进化论”〔1〕。他后来绝少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他的战友“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

就在他赴港求学的那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从英国于1840年挑起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推行殖民掠夺政策，并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了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群众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此伏彼起，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则是汹涌浪潮的高峰。随着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的萌发，加以外强中干的外烁作用，剧变的社会政治、思想领域

〔1〕〔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进入历史舞台。法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深化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激励了爱国主义的高昂，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爱国与变革的强劲双重奏给予青年孙中山以“希望和勇气”，香港工人拒修法规和停卸法货使他确信“中国人已有相当觉悟”，所以“战胜法国并非难事，只靠民众力量”。当然还“应当造钢铁的船”，依靠“木头船是没用的”〔1〕。他愈益密切地关注政局，否定现存政权的观念潜滋暗长，曾向檀岛的朋友表示：学有所成后“就要准备推翻满清”。后来，他强调了这场结局屈辱的战争给他的激励：“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2〕

1884年到1886年间，孙中山就读于港英当局所办的中央书院。由于阅读汉文书报存在困难，他在课外努力补习国学。当他修毕书院的中学课程后，他面临着生活的抉择。军事和法律曾是他的学习取向，但他终于选择了医学，“以医亦救人之术也”，况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十分落后，中法战争期间暴露出的救护工作的严重缺陷，更为引起了他的关注。

1885年夏，他与同邑外坐村人卢慕贞结缡。

孙中山的习医生涯，始自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

〔1〕〔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译本），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第157—161页。

〔2〕《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页。

校。在校期间不过年余，留给周围人们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教学中“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主张。他要求男生参加产科实习，并使校方采纳了这个合理建议。他还结识了同学郑士良和算学馆的学员尤列，经常议论“维新兴国”的有关问题。郑士良与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正是通过这位同窗的中介接触了秘密会社。1887年初，孙中山转入香港伦敦传道会和议政局议员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因为那里“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1〕}。在五个学年中，他研读了物理、化学、植物、解剖和药物等学科，取得优异成绩，但并不满足于专业知识。达尔文——其时刚逝世不久——的进化论令他心折。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使他兴奋。他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并把“通晓舆图”作为实学要旨。学习国学的热情依然饱满，认真探讨“历朝制度之沿革”和“古今治乱之道”。孙中山在大学阶段基本完成了“欧洲式的教育”，这种机遇在同代人中是罕见的。

孙中山更为热切地关注国事，经常同郑士良、尤列及稍后结识的同学陈少白到校舍附近杨鹤龄家的商店“杨耀记”聚会。他们上下陡峭的石级，穿过狭窄阴暗的街道，“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2〕}。许多“无所忌憚”的言论惊世骇俗，使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和尤列获得了“四大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